

※ 學術會議 ※

「劉宋的文本世界：跨學科的探索」 學術研討會紀要

何維剛*

在中古中國的一般認識中，劉宋一朝(420-479)夾在東晉與齊、梁兩個較顯眼的時段間；前者因王、謝等門閥世家文化而深受矚目，後者則是中國歷史上（甚至是世界史上）宮廷文化的高峰時期。相形之下，劉宋往往被視作一個過渡期。事實上，從歷史面向看，劉宋代表「南北統運競爭」的高峰、「皇權重構」的契機，影響到其對學術、宗教的利用與控制；一方面獎勵佛教、道教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促使高僧、道長做教內清整的工作。在文學史中，劉宋不僅是由「玄言詩」走向「抒情詩」的轉折點，也是顏延之、謝靈運、鮑照、謝莊、謝惠連、湯惠休、陶淵明等文學名家輩出的時代，甚至連帝王也都開始參與宮廷創作。如何擺脫這種歷時性詮釋的局限，來平視、正視劉宋時代有哪些特點，是此次研討會舉辦的初衷。「劉宋的文本世界：跨學科的探索」學術研討會，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劉苑如研究員、雷之波助研究員共同籌劃，於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假中國文哲研究所二樓會議室舉行。此次研討會邀請了包含文學、歷史、思想、宗教等不同領域及專長的七位論文發表人，以及數位與談人及專家學者，共同參與以劉宋為主題的跨界對談。

第一天的對談由日本京都大學川合康三教授的主題演講〈關於劉宋時期文學的幾個問題〉展開，由中國文哲研究所胡曉真教授擔任主持人，陳俐君女士（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擔任論文翻譯與即席口譯。川合教授對劉宋時期的文學提出三個研究與討論的面向：「從玄言詩到山水詩的變化——風景的發現」、「文學與政治緊密相連的關係」、「東晉到劉宋時期的文學家——陶淵明」。針對第一個主題「從

* 何維剛，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玄言詩到山水詩的變化——風景的發現」，川合教授指出南渡引發了人們對於所處世界的改觀；因著居住土地的改變，使人們以新奇的眼光看待外在世界。透過敏銳地意識山水、發掘外在世界，實則促成了「風景的發現」，人們「觀看」的方式也隨之改變。上古時期，「望祭」等眺望風景的儀式原先具有巫術性質，但到了羊祜的案例中，眺望成為君主與家臣宴遊樂事，或是如同陶淵明、謝靈運成為朋友出遊賞玩的對象。「文學與政治緊密相連的關係」是劉宋文學的第二個特色。相對於梁朝文學與政治分離的各種情形，劉宋時期的文學家往往兼具政治家身分，尤其以謝靈運、顏延之的作品最能展現文學與政治密不可分、文學作為傳達政治訊息手段的特色。謝靈運〈述祖德詩〉即是文學隱藏政治訊息的載體，詩文表面頌揚祖德，實則美化謝玄的官場失利，以及暗示謝靈運企圖北伐卻未被接納，繼而退出官場的怨恨。顏延之〈五君詠〉則以詠史體裁頌讚貫徹人生信念而不容於世的嵇康等人，寄託顏延之自身受到劉湛、殷景仁的排擠；此皆可見劉宋時期文學作品與政治情勢密不可分的關係。「東晉到劉宋時期的文學家——陶淵明」為切入劉宋文學的第三個重點，著眼於陶淵明的特殊地位。六朝時期的作家大多是王朝中心人物，並以京城作為創作中心。陶淵明所以能超越時代，正在於身處與他人不同之環境，方可構造出前所未見的文學。也因著陶淵明的文學作品超越時代，當代人雖能理解其優異之處，卻未能融入自己的創作中。除了蕭統所編纂之《文選》外，陶淵明的作品被大量保存，或許說明了在六朝時期，陶淵明的作品已然大受好評。如何將陶淵明的出現與劉宋時期的文學結合來看，當是未來猶待處理的問題。

第一場次的論文發表，著重於劉宋時期的佛教以及東亞局勢的變動，由中國文哲研究所廖肇亨教授擔任主持人，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林韻柔教授擔任與談人。新加坡佛學院紀贊教授〈劉宋佛教與政爭：以正史為中心〉一文以沈約編撰《宋書》為中心，結合南朝初期的相關佛教文獻，勾勒出此一時期佛教的政治斷面。劉宋時期的都城寺院，往往是皇族政治與宗教勢力結合的場域。如宋文帝劉義隆本身並不特別信奉佛教，但因政治情勢需要，本身亦對崇佛之風氣有所屈服。祇洹寺作為宋文帝時期的京師大寺，宋文帝、范泰、謝靈運等人都曾遊覽此寺或撰寫詩文。該寺於釋慧義擔任住持時期，曾對「踞食」一案激烈爭論，討論風波延及朝臣與皇帝。孝武帝時期試圖將佛教納入皇權統治之下。中興寺作為此一時期的皇家大寺，除了曾是孝武帝的登基之所，著名的義學僧人僧導、譯經師求那跋陀羅都曾駐於此，而當時重要的僧官，也多出於中興寺；得以窺見當時的政治勢力大多願意與譯經師等

「技術性」宗教專家交往。而寺廟作為襯托背景的舞臺，實則融會了政治、宗教的不同勢力。佛教與劉宋一朝的政治鬥爭，亦是關注劉宋佛教的重點。南朝時期皇權與教權的結合，以劉宋一朝為最，史料不僅可見劉宋僧徒還俗參政，官僚出鎮亦照舊例帶僧尼同行。此時官場所見僧尼，除了本身具備講經說法、操持佛事等宗教功能外，也多具有預見政治情勢的洞察力，並因本身身分特殊，即使涉入政爭，往往也能周旋於政治勢力之間而相對獨立。為數不少的僧尼捲入政治叛亂或戰爭，主要作用在於參與謀劃，或利用其身分或政治影響力為其穿針引線。這些政治參與無論成功與否，對其所在的教團及寺院都會產生直接的影響。

復旦大學歷史系徐沖教授〈「東虜」與「西虜」：五世紀初東亞局勢的變動與劉宋的成立〉一文試圖以「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雙重視野，由五世紀初赫連夏與北魏所構築的北方情勢，反思劉宋的成立實與東亞局勢變動息息相關。徐教授以謝靈運〈勸伐河北書〉中的「西虜」（赫連夏）與「東虜」（北魏）為切入點，認為此書作於元嘉五年赫連定占領長安以後，並通過鄭鮮之上表、《宋書》書法，推測「西虜」為五世紀初晉宋菁英對於赫連夏政權的正式稱呼。當北魏一統北方後，透過王朝德運的調整，將原屬於「邊緣政權」性質的赫連夏，歸入五胡十六國「天下國家」的譜系，構築了後人對於赫連夏政權的認識。而謝靈運〈勸伐河北書〉所代表的晉宋菁英觀點，標誌出赫連夏與北魏的同質性，以及與五胡十六國「天下國家」的異質性；除了可還原當代人的觀點，更加點出由五胡十六國到北朝的統一，是由赫連夏與北魏共同完成的「雙螺旋」進程。對於南朝而言，政權轉移的關鍵從暴力顛覆轉化成由君至臣的「禪讓」，而北伐的勝利，則成為功臣接受禪讓的關鍵所在。桓溫與劉裕二人，皆須透過北伐的勝利累積個人聲望，以達到「功臣」身分的極致。而劉裕北伐的時機點，在於赫連夏與北魏「雙螺旋」地終結五胡時代，乘虛而入，以致北伐成功，方得接受晉恭帝的禪讓，而成立劉宋。赫連夏與北魏對於五胡「天下國家」的終結，反倒意外參與了南朝歷史的開啟。

第二天的對談由劉宋時期的「天命」與「符瑞」展開，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劉淑芬教授擔任第二場次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沈凡玉教授擔任該場次與談人。南京大學文學院童嶺教授〈義熙年間劉裕北伐的天命與文學——以傅亮〈為宋公修張良廟教〉、〈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為中心〉一文，提出晉宋之際的天命有二：晉宋禪代之「小天命」與天下一統之「大天命」。東晉末年，「天命已移」成為少數菁英的共識，亦體現於傅亮「教」之文體書寫。義熙年間傅亮作

有二教：〈為宋公修張良廟教〉、〈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皆收錄於《文選》。相對於《文選》所收錄劉宋謝靈運、顏延之等一代文宗的文章，傅亮文章的意義應當放在義熙北伐的背景下加以閱讀、考察。傅亮於討伐盧循後，成為劉裕最重要的文膽，北伐期間隨著劉裕的後繼大軍北上，才有可能及時完成劉裕的文章委託。〈為宋公修張良廟教〉大抵於義熙十三年北伐初見成果之際，劉裕抵達彭城時所作。〈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則應作於義熙十四年劉裕主力回師彭城，兩篇文章皆暗示了「大天命」的逐步轉移。傅亮所作二教，向來不為治文學史者所重視。〈為宋公修張良廟教〉連結了漢朝劉氏血脈與新的帝王興起，文中對於「求士」的渴望，潛藏信息是恭迎高低士族為劉裕效命；可謂是劉裕與後秦決戰前夕，向將士、貴族宣告求士意圖與統一天下的使命。傅亮撰寫〈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時，劉裕已擊敗後秦，曾祭拜過漢高祖陵。文章透過楚元王將論述嫁接到劉裕本身，宣示相對於司馬政權，劉裕政權實則具有更大、更遠的天命。傅亮二篇教文之摹習典範，除了潘勗〈冊魏公九錫文〉外，卞範之、殷仲文深具手筆，亦可謂是傅亮寫作的「近典」。劉裕雖於歷史的進程中，錯失了統一天下的「大天命」，僅獲得江南的「小天命」；但是傅亮的二篇教文，兼具天命轉移的神聖性與辭采之文學性，其文史地位更應受到審視。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陳恬儀教授〈天命與君德：劉宋前期之符瑞與文學〉一文，透過審視宋武帝與宋文帝時期大量的符瑞產生，將符瑞視為統治者加強統治之正當性與聲望的方式。宋武帝時期的符瑞，大抵表現於「天命轉移」與「天命所歸」兩個層面。史書中對於劉裕體貌奇異的記載，明示劉裕具有天子之命。作者並透過傅亮〈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的書寫，指稱劉裕為漢朝楚元王之後，形塑其血統之純正性。劉裕受命之符出於嵩山，亦是透過嵩山位於天下之中，為劉裕塑造「天下所歸」的聲望，以達到禪代的目的。宋文帝時期的符瑞出現，大抵集中於在位中後期，並擅長透過符瑞營造向心力與政治認同。文帝即位以來，劉氏政權逐漸牢固，政治眼光大抵集中在北方的威脅以及宗室問題。此一時期大量出現的「嘉禾」祥瑞，除了反映內政治績、王者盛德，也暗示著文帝欲北伐、統一天下的理想。作於此時的鮑照〈河清頌〉，透過罕見的符瑞「河清」歌頌文帝聖王功業，除了可與宋文帝治理後期大量產生的符瑞相互參看外，也可窺見文帝頗欲利用符瑞製造太平盛世、天命歸宋的氣氛。祥瑞頌的文體兼具祥瑞與頌德，透過頌文的鋪陳，發揚帝王之功業盛德，進而凝聚群體。祥瑞頌在書寫上，除了著重德行、符瑞的因

果表述外，透過符瑞之「物象」展演及挖掘出君王之德及虛筆筆法的應用，亦迥異於詠物賦著眼於「物」體本身的寫作傾向。

第三場次論文發表則回歸到劉宋時期的文學、文本以及閱讀，由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高莉芬教授擔任主持人，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陳秋宏教授擔任與談人。中國文哲研究所雷之波教授〈有文學就有文學史嗎？——「元嘉文學」重探〉一文，試圖透過「文學與文化的關係」以及「文學『發展』的問題」兩個層面，重新探討近年文學史如何論述劉宋一朝。文學史作為一門重要的人文學科，是認識一個民族的重要切入途徑，例如：Hans Ulrich Gumbrecht、David Perkins 等人對於文學史本身的構築與討論，頗有助於重新思考劉宋時期的文學作品與文學史的建構。過往文學史對於文學現象的建構大抵可分為三個定位：作者定位、政治斷限與文學史斷限、流派觀念。即使是新近撰寫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包含政治朝代的限制、樂府的發展，以及陶淵明、謝靈運等作者的定位，其新創觀點仍是建立於此框架上。實際上，文學史不僅是文學的歷史，同時也是「批評」。以謝惠連〈秋思〉為例，雖然以傳統文學史的書寫來看，這首詩欠缺諸多背景資訊，難以就上述三個定位來加以認識。但若回歸到文本本身，除了可置於秋夜書寫的脈絡下予以認識外，透過歸納相同主題的文本作品，詩歌內容的形式以及背後所蘊含的書寫策略，也是重新思考元嘉文學史書寫的新線索。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祁立峰教授〈「險」與「俗」——再論《詩品》對鮑照之評價及其風格影響〉一文，透過「險」與「俗」術語的論述，討論鮑照「奇險」風格的呈現，以及該風格對於齊梁文壇的影響。鮑照、湯惠休摹擬民歌樂府的體裁，在鍾嶸的時代廣泛流行，樂府俚俗所造成的爭相仿效，卻反倒構成了「鮑休」的負面形象。因此，與鮑照所連結的「俗」，其實兼具兩種意涵：民歌樂府的通俗，以及普遍世俗的仿效。「險」常與「俗」合而並用，往往指涉超經驗的想像，不合理卻又巧妙、形象鮮明的描摹技巧。此種書寫風格的影響，或可見於沈約詩中大量運用超經驗的描寫。鮑照於詩歌之中，大量運用複雜詭譎的構字、鑲嵌模式，此於沈約之《宋書·鮑照傳》被視為「鄙」與「累」。但這樣的驚險累句、修辭以及超經驗的摹擬，實則為「奇險」所展示的面向；而此「險」正為「巧構形似」的核心所在。是以對於「險俗」的解釋，應當視為「險」的語言大量摹擬使用，使這樣「形似」技藝流於普遍世俗。鮑照的文學風格與構詞形式於齊梁之際造成廣大迴響，作者追求誇彩逞詞，讀者亦嚮往超現實的閱讀經驗。這種詩風影響

之流「俗」，本非鮑照詩歌的弊病，卻反被加諸於鮑照之詩歌風格上。此皆是辨析「險」、「俗」等術語之際，猶應重新加以省思之處。

中國文哲研究所楊玉成教授〈風景：晉宋之際自然觀與感覺結構的變遷〉一文，透過「華」（花）、「風」、「景」、「物」、「色」等關於空間的複合辭語，探究晉宋之際存有詩學的特徵。「華」既是「物」也是「色」（光），南朝時期「華」、「花」二義相互區別，「華」不再指涉植物，而用於「日華」、「月華」等光、繁榮之意。「華」於戰國晚期的辭賦已見新的光影與空間感，為南朝「物色」觀念之先聲。「華」與太陽的緊密結合、陰陽五行與道教傳統中以蓮花描述「心」，是中古對於世界感知的特色。南朝以後「花」取代「華」，偏重於植物學觀念，光與動態的消退，反映著對於世界感知的變化。「風」、「景」意味著太陽彰顯萬物、氣（風）使萬籟聲響，宇宙的互相感應，透過影子與回音構築中古對於世界的想像。相對於西晉的大一統，東晉南朝因著國家分裂、環境變異，更能感受到自然（山水）與國家（山河）的差異，「風景」始終貫穿於此同異交錯之間。「影」於晉宋之間開始成為文學的新主題，形成一光影美學。「風景」初與陽光及陰影有關，兼具空間（風景）與時間（光陰）性質，此一存有詩學直到中晚唐認識世界開始客體化才逐漸消退。「物色」的指涉相當廣泛，在南朝時期使用數量上甚至超越「風景」。「物色」的觀察關乎對於世界認識的轉變，東晉玄言與山水文學明顯受到佛教影響，透過「心」認識外在世界，象徵著主體美學的興起。此尤其表現於慧遠東林寺集團對於山水美學的發展上。嵇康〈聲無哀樂論〉繼承先秦以來「道」的敞開，其思路不僅合乎曹魏的國家政策，也主導中古思想的動向，頗可視為正始玄學的代表作。〈聲無哀樂論〉將自然視作他者成為山水美學的前提，使人得以擺脫人類中心，朝向無限。「山水無情」成為新世界觀的組成，道出中古文人共同的感受，「物無情而感有情」總結了這種世界觀。

與前後的東晉與齊、梁相比，學術界對劉宋的研究與認識相當單薄，無論是文學或歷史議題，劉宋大體上被視作一個過渡期。此次研討會透過宗教、歷史、文學等不同層面，試圖提出一個新的思考：在劉宋此一斷代基礎上，如何使跨領域的對話成為可能。「劉宋的文本世界：跨學科的探索」作為此次研討會的主軸與初衷，藉由安排不同領域、背景的學者深度對談，除了激盪原有的思維模式外，更試圖探求諸多概念形成之前的劉宋樣貌。期望透過關注視野的開拓，得以深化相關主題的思索與討論，並重新認識劉宋的文本世界。